

# 維新與衛道： 王先謙的文化心態

• 董劍平

在中國近代史上，王先謙(1842-1917)與他的湖南同鄉葉德輝，同被視為極端頑固派營壘的代表人物。王先謙曾大罵康有為、梁啟超為「上則欲散君權，下則欲行邪教」<sup>①</sup>，「離經畔道，惑世誣民」<sup>②</sup>。因此，他們叫嚷「翼教」「護聖」，要「翼」封建孔子之教，「護」封建孔子之聖。但另一方面，王先謙具有激進的洋務思想。他領銜創辦影響深遠的時務學堂和《湘報》，並創建多個新式企業，故又不能簡單地將他歸為一貫頑固愚昧。

王先謙是湖南長沙人。13歲應童子試，16歲中舉，24歲成進士，得到了欽點翰林院庶吉士的社會地位，可謂少年得志。此後，他先後在國史館、實錄館擔任過纂修、總纂等職，歷任雲南、江西、浙江鄉試的正副考官，官至國子監祭酒、江蘇學政。1889年2月，王先謙因病陳請開缺回籍。回籍後，他以曾在國家最高學術機關供職的光榮身分，先後主講思賢講舍、城南書院、岳麓書院。王先謙一生在歷史、文學、哲學、語言學等領域均有研究，其所著、校、注、輯、刊的著作達50種，計3,200餘卷，是位著名的儒學大師。王先謙生於第一次鴉片戰爭，逝於新文化運動早期，可謂生逢中國三千年來所未有的大變局。本文不打算全面評介王先謙一生，只是從分析他的文化心態出發，來理解這樣一個在大變局中既積極維新又頑固衛道的複雜人物。

近代湖南被譽為「惟楚有材」。在這批「楚材」中，王先謙與郭嵩燾、曾紀澤是莫逆之交。王先謙的洋務觀無疑受到郭嵩燾和曾紀澤的影響。而鴉片戰爭前夕，王朝季世敗象日顯，經世致用已蔚然成為新的社會思潮。

## 經世致用的洋務觀

近代湖南在全國政治和思想舞台上佔着一席奇特而又重要的位置。湖南一方面以保守「霸蠻」而出名，另一方面，又出了不少大膽、活躍、能「開風氣之先」的人物，所以被譽為「惟楚有材」。在這批「楚材」中，王先謙與郭嵩燾、曾紀澤是莫逆之交。郭嵩燾是在封建廟堂之上首倡「循習西洋政教」的勇士，是士



王先謙被視為極端保守派的代表，但另一方面，卻又具有激進的洋務思想。

大夫階級中最早主張向西方學習借鑒的人物。正因此，郭嵩燾遭到了頑固派、清流黨的辱罵、譏笑與誹謗，甚至連湖南人也與他「至恥為伍」。然而王先謙對他卻極為尊敬，稱他為「魁奇傑特之士」<sup>③</sup>，「皦爾風節，百世之師」<sup>④</sup>。郭嵩燾去世後，他具呈清廷請為郭立傳賜謚，但沒有得到准許。他收集郭的遺著，刻印成《養知書屋遺集》，並親自作序。至於和曾紀澤的關係，王先謙自稱「吾兩人交誼，非他可比」<sup>⑤</sup>。他很欽佩曾紀澤，稱他「偉識深心，洞若觀火」<sup>⑥</sup>，常與之推心置腹地交換意見。王先謙的洋務觀無疑受到郭嵩燾和曾紀澤的影響，但在王先謙的意識中，實已具有了接受洋務思想的酵素。

王先謙作為一名以儒學為立身處世原則的士大夫，他的洋務觀實與儒家經世致用的精神分不開。鴉片戰爭前夕社會激烈動盪，王朝季世敗象日顯，經世致用更蔚然成為新的社會思潮。魏源編輯《皇朝經世文編》，揭示了「時務莫切於當代，道類存乎實用」的經世目的，王先謙對此傾心佩服，把魏源的部分著作定為書院士子必讀之書。

第二次鴉片戰爭失利，整個民族的巨大創痛，觸發了包括王先謙在內的一批士大夫的危機感。早在1861年王先謙就賦詩抒懷：「河山殘列郡，天地贖危樓。……倚劍聽哀角，吾生浩蕩愁！」<sup>⑦</sup>而後第一次邊疆危機，沙俄武裝佔領伊犁，日、美侵略台灣及琉球，英國侵入西南邊疆，這一連串的災難，使王先謙認識到「西方諸國環境逼處，狼顧鷹視，蓄謀至深」<sup>⑧</sup>。鑒於此，他和同時代

一批比較明智的洋務人士一樣，認為「切要之圖，莫於洋務」，並提出了「以制器為先」的主張。

於是他提出向西方先進軍事學習，包括購買、仿造外國船艦：製水雷、修炮台、架電線、築鐵路：用西洋方法訓練士兵<sup>⑨</sup>。王先謙認為：「西洋強，源於富，富源於商，商源於工，工源於學。」<sup>⑩</sup>他還大力主張民辦新式企業，否定官辦，毫不客氣地針砭了有礙洋務興辦的弊政。

但是，在王先謙思想裏，中國故有的禮樂教化的儒家文明被推崇為「體」而居於主導地位，把西學明確地框在「用」的層面，使「體」、「用」分離，各就各位，各司其職。他反覆強調「將中西學界劃清」<sup>⑪</sup>，明確規定：「西學無論巨細，止當以工藝統之。」<sup>⑫</sup>王先謙指出：「蓋形而上者謂之道，形而下者謂之器」<sup>⑬</sup>，「夫工藝之學，形而下者也，與中學之形而上者，古今殊途，本非治世之要務，然而處交通之世局，挽既倒之狂瀾，欲不從事於此，其勢不能」<sup>⑭</sup>。在王先謙看來，西學——形而下的「器」，只是為了挽救中學——形而上的「道」，才有其存在的價值，但那僅僅是工具價值。

## 加入維新陣營

中日甲午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大轉折，歷時30年的洋務運動經此役便作了總結。中國的有識之士開始醒悟，在物質文明與科學技術背後，其實還有更重要的東西，那就是政治制度的改革。於是，康有為等人發起了規模空前的維新運動。湖南是變法維新的先進省分。戊戌變法時期，在湖南主持政務的重要官員中，巡撫陳寶箴、學政江標、按察使黃遵憲，都是力主變法的維新人物。這為譚嗣同、梁啟超、唐才常等人宣傳維新思想提供了有利的條件。於是，他們成立了南學會，出版了《湘學新報》、《湘報》，創立了時務學堂，招收學生、批評時政、鼓吹變法、宣揚民權思想，從而成為全國矚目之區。

這時，王先謙對維新運動的態度頗為矛盾複雜。在湖南維新運動前期，他有不少贊成維新的舉動，但後期則極力地反對。而他的轉變當以1898年春為界。

1896年，作為全國維新運動重要輿論陣地的《時務報》在上海創辦，湖南訂者寥寥無幾。王先謙時任岳麓書院山長，他閱讀了《時務報》後，認為該報「議論精審，體裁雅飭」，所列文章大都是試圖掃除時弊，拯救危亡的「憂時君子，發憤之作」，足以使人「開廣見聞，啟發志意，為目前不可不看之書」<sup>⑮</sup>。於是他會同城南書院和求忠書院院長商定，用公款購送《時務報》給在院學生，以便「俾士子得以瀏覽通知」<sup>⑯</sup>。他親自發下〈購時務報發給諸生公閱手諭〉，懇切地指出：「竊維士子讀書，期於致用。近日文人，往往拘守帖括，罕能留意時務」，故應該「多讀有用之書，相與講明切磋，儲為國器」。他望士子們「開拓心胸」，「上備國家棟樑之用」<sup>⑰</sup>。時任湖南學政的維新人物江標，特意把王先謙的勸閱手諭寄給《時務報》總理汪康年，刊入光緒二十三年（1897）正月二十一日《時務報》第十八冊中廣為宣傳，對王先謙備加讚譽。在王先謙的促進下，《時

王先謙任岳麓書院山長時閱讀了《時務報》，認為該報所列文章大都是試圖掃除時弊，拯救危亡的「憂時君子，發憤之作」，遂用公款購送《時務報》給在院學生，以便「俾士子得以瀏覽通知」。

務報》在湖南廣泛流傳，「幾致家弦戶誦」，從而促使湘中知識份子了解世界大勢，接受維新思想的影響。

1897年，王先謙聯絡熊希齡、張祖同等六人，建議在湖南建立時務學堂，由士紳捐集資金，購買書籍和儀器，以便講求時務，培養學通中西的新式人才。這一主張很快得到巡撫陳寶箴的贊同。籌建過程中王先謙鼎力襄助，出力頗多。當黃遵憲提議延請維新巨子梁啟超為時務學堂總教習時，王先謙「亦稱美焉」。11月，梁啟超到湘，王先謙又主張「特加熱鬧，議於曾忠襄祠，張宴唱戲，普請各紳以陪之」，為梁啟超接風，以示熱烈歡迎<sup>⑩</sup>。後來甚至有人認為時務學堂是由王先謙主持辦理的。時務學堂是湖南維新的中心之一，宣傳了變法思想，培養了大批維新人才，影響很深遠。雖然後因議論日益激進，導致王先謙的不滿和激烈反對，但創建之功還是應該肯定的。

除此以外，王先謙還積極贊成成立南學會和創辦《湘報》，他認為：「天下學術，斷不能盡出一途」<sup>⑪</sup>。南學會成立開講時，王先謙隨同陳寶箴等到會參加聽講。他在《自定年譜》中寫到：「學會之初立也，中丞邀余偕往，聽講者亦多。中丞升座，首舉『有恥立志』四字為言，聞者洒然動容。」<sup>⑫</sup>他認為，「道合同，各自立會，互相切劘，亦不失敬業樂群之義」<sup>⑬</sup>。由於他的態度積極，譚嗣同、熊希齡等還屢次承邀他前去講學。王先謙對於《湘報》也給了很高的評價：「《湘報》刊行，見聞廣遠。開拓民智，用意甚善。」<sup>⑭</sup>

如果說王先謙推廣《時務報》、籌建時務學堂等舉措，是在思想上、人才培育上推動了湖南的維新運動，那麼他在湖南積極參與創建新式企業，便是將維新的理念付諸實踐了。1895年，王先謙首先和陳寶箴商議在長沙創辦私營的和豐火柴公司，集股約十萬兩，製火柴十餘種，營業情況良好。繼這之後，王先謙又在1898年春和張祖同、熊希齡等集股創建寶善成製造公司。該公司先是官督商辦，眾人推王先謙和熊希齡等為經理，由王先謙負責實際事務，可是經費奇缺，內部意見紛紜，「任舉一端，皆無驟效」<sup>⑮</sup>。儘管如此，王先謙仍然勉力支撐，以圖為湖南奠一富強之基。此後，寶善成製造公司轉為官辦，紡織、舂米、榨油等項目次第舉辦，先後搞出了比舊式工具效率提高十餘倍的製辦機，還設立了一個小型發電廠，湘省首次有了電燈照明。後來的湖南電燈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在寶善成的基礎上創辦而成。不久，王先謙又向陳寶箴遞呈開辦小內河輪船的稟稿，歷盡曲折，1897年夏才得到湖廣總督張之洞的批准，次年開始航行。湖南、湖北之間開通輪船，大大促進了各類商品物資的流通，有利於兩省經濟的發展。

更值得注意的是，王先謙贊成廢棄八股取士，改革科舉制度。

王先謙本人是沿着科舉道路而躋身於士大夫階級上層的，所以他一生的榮譽都與這一制度密不可分，而在他的文化心理中，實與八股詞章有着深厚的情感聯繫。光緒元年(1875)，「合肥李公有請廢制藝之疏」，王先謙曾堅決反對<sup>⑯</sup>。然而，隨着時勢的變遷，王先謙認識到科舉制度不變不行，因此他專作〈科舉論上〉，痛切地陳述了制藝取士的弊病<sup>⑰</sup>：

獨制藝自明至今名其家者可僕指，而陳言相因，無窮期也。倖而取科目，

1898年春，王先謙和張祖同、熊希齡等集股創建寶善成製造公司，先後搞出了比舊式工具效率提高十餘倍的製辦機，還設立了一個小型發電廠，湘省首次有了電燈照明。後來的湖南電燈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創辦而成。

入仕途，唾棄如芻狗；不則牽率因循，頭童齒豁，弗能決舍。而遠大之學業，或終身未能夢見，上之人覩通才輩出，不以為早達歷練而成，而歸其效於科目，至於深山困餓，把卷窮年，飲恨入地，不知幾千萬人！使生附志士之列，而死蒙鄙儒之稱，誰之咎也？況今之時文，決裂橫潰，其體已不能自立。昔人謂代聖賢立言者，去之彌遠。

直到戊戌變法失敗，西太后在反掌之間恢復了一切舊制，下令恢復制藝取士，王先謙仍作〈科舉論下〉，堅持抨擊制藝取士的弊病。

## 起而衛道

時至1898年春，王先謙對維新運動的態度發生了逆轉。

戊戌春二、三月，改革的風潮席捲京師的每個角落，朝野上下為之震動。羅振玉回憶當時的情景說：自從康有為入都倡導變法，「遂如春雷之啟蟄，海上志士，歡聲雷動，雖謹厚者亦如飲狂藥」<sup>②6</sup>。

在湖南，譚嗣同、梁啟超、唐才常等人把挽救民族危亡的熱情、對封建專制主義的憤恨和對民主制度的嚮往，集中通過民權宣傳表達出來。他們猛烈地批判君為臣綱的謬說，提出了君僕民主的看法，並斥責歷代帝王為「獨夫民賊」。他們公開呼籲，對於腐朽的清王朝，只有「執民權而強之，用民權而變之」<sup>②7</sup>。他們堅決地表示，「今之策中國者必曰興民權」<sup>②8</sup>。他們把這些意見登諸報刊又在學堂裏宣傳，致使青年學生趨之若鶩，一個個都成了民權思想的傳播者。

維新派這些驚世駭俗的議論改革要求，大大出乎王先謙的預料，也超出了他所能接受的範圍。於是，王先謙起而衛道，率領着「翼教」者們，發起了對維新派的攻擊。湖南的頑固士紳寫了大批攻擊維新運動的文章，由王先謙的門生蘇輿編成《翼教叢編》，其目的在於：「將以遏異學之橫流，而使之聖教昌明，多士咸得涵泳詩書，不復為邪說詖詞所惑也。」<sup>②9</sup>王先謙認為此書「於康梁造謀，湖南捍亂，備詳始末，亦佳書也」<sup>③0</sup>。

從湖南士紳攻擊維新運動的言論中可以看出，他們最為仇視的是民權之說<sup>③1</sup>：

今康梁所用以惑世者，民權耳，平等耳。試問權既下移，國誰與治？民可自主，君亦何為？是率天下而亂也。平等之說，蔑棄人倫，不能自行，而願以立教，真悖謬之尤者！

他們十分害怕民權之說，大聲疾呼：「民主萬不可設，民權萬不可重，議院萬不可變通」，不然的話，「不十年而二十三行省變為盜賊淵藪矣」。如果行民權平等之說，「父毆子坐獄三月，子毆父坐獄三月，輕重罕別，倫理滅絕，不十年而四萬萬之種夷於禽獸矣」<sup>③2</sup>。於是他們發出了「狂瀾不挽，將有滔天之憂：

時至1898年春，王先謙率領着「翼教」者們，發起了對維新派的攻擊。湖南的頑固士紳寫了大批攻擊維新運動的文章，由王先謙的門生蘇輿編成《翼教叢編》，他們最為仇視的是民權之說。

毒焰蔓延，必成燎原之禍」的緊急呼籲。王先謙也大罵康梁：「謬托西教，以行其邪說，真中國之巨蠹，不意光天化日之中，有此鬼蜮。」<sup>33</sup>在王先謙和封建勢力的圍攻下，湖南維新運動呈現衰憊之勢。

王先謙從積極支持到全力反對維新運動的態度，表現了一種不易理解的矛盾狀態。但是，我們從他贊成和反對的內容中可以看出，他的思想其實仍未超出「中體西用」的框架，所以當維新派的言論動搖到「中學為體」這一根本時，便引起他的強烈責難。

興學堂、辦報紙、開工廠，這些和王先謙的洋務主張是一致的。而且，時務學堂初建之時，本以「中體西用」為宗旨，在〈時務學堂招考示〉中清楚地寫着：「查泰西各學，均有精微，而取彼之長，補我之短，必以中體為根本。」<sup>34</sup>梁啟超就任中文教習後，時務學堂卻成了宣揚民權學說，鼓吹西方政教，抨擊封建制度的場所，它的存在正導致着「典章廢，制度湮，綱常墮，名教壞，膠擾擾，幾不復知尊君親上之大經」的局面<sup>35</sup>。當王先謙看到在時務學堂教習批語中，梁啟超寫道：「臣也者，與君同辦民事者也，如開一舖子，君則為其舖之總管，臣則為其舖之掌櫃等也，有何不可去國之義」<sup>36</sup>：「今日欲求變法，必自天子降尊始，不先廢去跪拜之禮，上下仍習虛文，所以動為外國訕笑也」<sup>37</sup>。讀了這些「連篇累牘」的「悖逆語」，王先謙認定梁啟超「志在謀逆」<sup>38</sup>，駭詫之餘，大發雷霆，指斥梁啟超「專以無父無君之邪說教人」，是「得罪名教之亂臣賊子」<sup>39</sup>。

我們知道，在王先謙的深層文化心理中，「堯舜周公孔孟之道」、「聖人之學」，是判斷是非、曲直、善惡、真偽的尺度。民權平等之說的提倡和傳播，恰恰蔑視了儒家經典所確立的封建綱常倫理的權威。

在綱常名教受到衝擊的時刻，王先謙不能不憂心忡忡，因為：「吾人捨名教綱常，別無立足之地；除忠孝節義，亦豈有教人之方？」<sup>40</sup>於是，他殫精竭慮地保衛聖道，並表示：「民教綱常之大，豈容稍有假借？弟在講席一日，必竭一日維持之力，雷霆斧鉞，所不敢避。」<sup>41</sup>這就是王先謙在維新運動時期由積極支持轉向真誠反對的根本原因。

辛亥革命的颶風最終將王先謙吹進了頹唐境地。據葉德輝《葵園四種·跋》記載：「辛亥之奇變，此公（指王先謙）所不及料，而亦非所忍見者也。」<sup>42</sup>王先謙一邊哀嘆着「誰料兒童驚戰伐，白頭還作亂離人（咸豐辛亥，粵寇圍長沙，余甫十歲，今又辛亥矣！）」<sup>43</sup>，一邊「遁跡山林，罕與人世相接」<sup>44</sup>。此後，他便「無所營求，惟把書度日而已」<sup>45</sup>，完全回到了自己的學術天地。

王先謙是十九世紀傳統士大夫的典型代表。在西方文化的挑戰和民族危機的雙重壓力下，他拖着沉重而又堅固的傳統文化鐵鏈，走進了西與中、新與舊、現實與理想的劇烈衝突之中。他能夠積極肯定西洋的器物文明，是因為他承認世界已經變了，有了變通意識，進而提出了激進的洋務思想。在戊戌維新高潮中，他在維新的路上剛剛邁出頗為出色的一步之後，卻再也走不下去了，他開始真誠地、激烈地走入反動，最終被時代所拋棄。總其一生，「愛國憂時枉瀝肝，半生血淚幾曾乾？」<sup>46</sup>這兩句詩，恰是王先謙對自己政治生命的寫照。

王先謙從積極支持到全力反對維新運動的態度，表現了一種不易理解的矛盾狀態。他的思想其實仍未超出「中體西用」的框架，所以當維新派的言論動搖到「中學為體」這一根本時，便引起他的強烈責難。

### 註釋

- ① 〈梁節菴太史與王益吾祭酒書〉，《石印翼教叢編》，卷六。（《石印翼教叢編》，線裝、一函，藏於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古籍庫。下註此書，均此版本。）
- ② 〈汨羅江鄉人學約糾誤〉，《石印翼教叢編》，卷四。
- ③ 〈《養知書屋遺集》序〉，《葵園四種》，頁91。
- ④ 〈兵部左侍郎郭公神道碑〉，《葵園四種》，頁187。
- ⑤⑥ 〈與曾襄侯〉，《葵園四種》，頁851：850。
- ⑦ 〈登岳陽樓〉（辛酉，咸豐十一年，1861），《葵園四種》，頁353。
- ⑧ 〈復日本宗方北平〉，《葵園四種》，頁885。
- ⑨ 〈與陳子元觀察〉，《葵園四種》，頁859。
- ⑩⑫ 〈復萬伯任〉，《葵園四種》，頁900：900。
- ⑬⑭ 〈與俞中丞〉，《葵園四種》，頁895：894。
- ⑮ 〈復黃性田舍人〉，《葵園四種》，頁928。
- ⑯⑰⑱ 〈岳麓院長王益吾祭酒購時務報發給諸生公閱手諭〉，載范文瀾、翦伯贊等編：《戊戌變法》（上海：神州國光社，1953），第4冊，頁549。
- ⑲ 熊希齡：〈上陳中丞書〉，載《湘報》，十二號。
- ⑳㉑㉒ 〈復畢永年〉，《葵園四種》，頁861。
- ㉓㉔㉕㉖ 〈王先謙自定年譜〉，卷中，卷下（光緒二十四年，民國三年），《葵園四種》，頁744：745：744：841。
- ㉗ 〈致俞中丞〉，《葵園四種》，頁884。
- ㉘㉙ 〈科學論上〉，《葵園四種》，頁7：6。
- ㉚ 〈貞松老人遺稿〉，同⑯，第4冊，頁249。
- ㉛ 《湘報類纂·雜錄》，已上，頁12。
- ㉜ 梁啟超：〈論湖南應辦之事〉，《梁啟超選集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4），頁72。
- ㉝㉞ 蘇輿：〈《石印翼教叢編》序〉，《石印翼教叢編》，卷首。
- ㉟ 〈賓鳳陽等上王益吾院長書〉，《石印翼教叢編》，卷五。
- ㊱ 〈王幹臣吏部實學平議〉，《石印翼教叢編》，卷三。
- ㊲㊳ 〈復吳生學菴〉，《葵園四種》（長沙：岳麓書社，1986），頁864：863。
- ㊴ 《時務學堂招考示》，同⑯，第4冊，頁494。
- ㊵㊶ 〈學堂日記梁批〉，《覺迷要錄》，卷四，頁22：29。
- ㊷ 〈賓鳳陽等來書〉，《葵園四種》，頁874。
- ㊸ 〈復洪教諭〉，《葵園四種》，頁870。
- ㊹㊺ 葉德輝：《葵園四種·跋》，《葵園四種》，頁940。
- ㊻ 〈再答〉（辛亥，宣統三年，1911），《葵園四種》，頁680。
- ㊼ 〈題杜詩二絕〉（辛亥，宣統三年，1911），《葵園四種》，頁681。

董劍平 1958年生。197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，1988年獲東北師範大學史學碩士學位，現任《烟台師範學院學報》編輯。